

大轰炸中的伟人身影:周恩来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

丁英顺



抗战时期的周恩来

全面抗战爆发后,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的同时,对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等重要城市进行狂轰滥炸。进入相持阶段后,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,重庆成为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大规模轰炸持续时间最长、轰炸次数最多、损失最惨重的城市。

在重庆大轰炸中,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第一线,他们勇敢而坚定的身影,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。

“江上焚舟,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”

1938年10月,武汉3镇处于日寇的包围中,形势危急。当时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,各抗日机关正加紧撤离武汉。而新华社社部分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,为了坚持党的宣传阵地,传播党的正确主张,依然坚守在武汉。

根据形势的发展,新华社社采取种种应变措施,即调动一部分人力、财力,先期至重庆筹备续版。一旦汉口不守,马上在重庆出报,不使党报中断一天。对于留汉坚持工作的人员也作好了安排,每人预备一套军装,发了八路军徽章,一旦武汉失守就突围,徒步奔赴重庆。

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于当前的紧张局势很难充分、完善地实施相应计划和组织安排,入川的交通工具被抢的抢、占的占,场面一片混乱。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,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,又领导着中共中央长江局和《新华日报》,不顾事务繁杂,经常彻夜不眠地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有序地撤退。

10月22日,日寇逼近武汉,日机轮番轰炸,硝烟四起。下午4点,在周恩来的送行下,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社社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,率领办事处和新华社社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“新升隆”轮撤离武汉,西

去重庆。同行的还有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钱瑛、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、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,加拿大护士简·尤恩等。

“新升隆”是一艘小轮船,中共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,租来运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社100余人以及全部器材。此时,船上已相当拥挤。当船尚未启航时,又有不少难民要求搭船离境。根据周恩来的指示,“西迁的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,帮助他们逃离日本鬼子的杀戮,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,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”,同志们宁愿挤一点,也尽力满足难民的要求。

第二天下午3点多,“新升隆”轮行至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时,4架日机突然飞临上空,连投数枚炸弹,轮船不幸被击中,顿时起火。其后,日机轮番低飞,用机枪扫射。“新升隆”轮在火焰中渐渐下沉,船上伤亡80多人,其中新华社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潘美年、项泰、李密林、李元清等25人不幸遇难。

周恩来在长沙听说“新升隆”轮被炸后,深感痛心。后来得知,“新升隆”轮被炸,是由于日伪特务得到情报,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要乘这艘轮船西去重庆,而专门组织了这次轰炸行动。万幸的是,周恩来躲过了这次劫难。

而此前的10月19日,周恩来就曾经在日机轰炸中遇险。

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刘九洲回忆,这一天,周恩来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发,去参加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。半路上,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,江汉关上顿时一片混乱,人们争相逃命,眼看一架日机朝着人群俯冲下来,刘九洲连忙拉住周恩来的手,要他赶快躲避。周恩来看见江堤上人群乱作一团,他一下子挣脱了刘九洲的手,一个箭步冲上大堤,一边跑一边让慌乱的群众赶快散开。就在这时,一颗炸弹呼啸而至,

1940年5月的一天,日机空袭重庆,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听到空袭警报后,躲进了防空洞。不一会儿,日机飞行至红岩嘴上空盘旋,突然,巨大的爆炸声响起,日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了办事处前面的山沟里。警报解除后,大家回到办事处,发现大楼的墙壁被震坏了很多大块,非常气愤也很担心。这时,周恩来站到被震坏的大楼前面,坚定地对大家说:“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,迫使我们屈服投降,但这是我们炸不走的。”说完,特意让办事处人员给他和邓颖超在震坏的墙壁前照相留念。1985年10月,邓颖超重返红岩时见到了这张照片,感慨道:“当年我和周恩来在这里拍照,就是表示我们是炸不走、压不倒的!”

这一年,曾家岩50号周公馆也遭到轰炸。日机来袭时,周恩来正和郭沫若在房内谈话,听到警报后,赶紧和工作人员来到周公馆的防空洞躲空袭。躲避中,突然,他们从防空洞的座位上被震下来。警卫员刘九洲知道,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,赶紧从防空洞出来,正好看见周恩来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,他赶紧叫大家灭火。幸好发现得早,没有蒙受什么大的损失。

“新升隆”轮被炸,是《新华日报》办报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,但英勇的新华人并没有被吓倒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,他们在被炸后的两天即10月25日,就顺利与武汉《新华日报》完成交接,成为抗战烽火中没有中断过一期的报纸,创下了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“我们是炸不走的”

国民政府迁渝后,重庆成为中国抗战之枢——战时首都以及大后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,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,日军在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的5年半时间里,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余架次空袭重庆城区,进行了惨绝人寰的“无差别大轰炸”。其中,尤以“五三”“五四”大轰炸最为惨烈。

1939年5月3日下午1点起,36架日机对人口密集、商业繁荣的重庆渝中半岛进行轮番轰炸,上百颗爆破弹和燃烧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,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2000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成为一片火海,大火蔓延,昼夜不熄。重庆人民甚至来不及擦洗血泪,5月4日下午6点,27架日机再次来袭,都邮街、小梁子、七星岗等10余条中心街市被烧毁,大火延烧两日。国泰电影院被炸,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。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、法国等驻华使馆,甚至连挂着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。在重庆支援抗战的陈纳德将军亲眼目睹了“爆裂的竹子溅出火星,坍塌的板壁燃起大火,整座城市烈焰滚滚,一直烧到江边,1万多人被大火烧死或者呛死”。

在这次大轰炸中,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城区驻地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均被炸毁,工作人员只得连夜迁往重庆西北角的红岩嘴。

1940年5月的一天,日机空袭重庆,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听到空袭警报后,躲进了防空洞。不一会儿,日机飞行至红岩嘴上空盘旋,突然,巨大的爆炸声响起,日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了办事处前面的山沟里。警报解除后,大家回到办事处,发现大楼的墙壁被震坏了很多大块,非常气愤也很担心。这时,周恩来站到被震坏的大楼前面,坚定地对大家说:“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,迫使我们屈服投降,但这是我们炸不走的。”说完,特意让办事处人员给他和邓颖超在震坏的墙壁前照相留念。1985年10月,邓颖超重返红岩时见到了这张照片,感慨道:“当年我和周恩来在这里拍照,就是表示我们是炸不走、压不倒的!”

这一年,曾家岩50号周公馆也遭到轰炸。日机来袭时,周恩来正和郭沫若在房内谈话,听到警报后,赶紧和工作人员来到周公馆的防空洞躲空袭。躲避中,突然,他们从防空洞的座位上被震下来。警卫员刘九洲知道,一定是附近落了一颗大炸弹,赶紧从防空洞出来,正好看见周恩来的办公室附近起火了,他赶紧叫大家灭火。幸好发现得早,没有蒙受什么大的损失。

“我们的防空洞随时为人民开着”

重庆大轰炸期间,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防

空力量十分薄弱,重庆军民只能采取消极防御,主要办法就是躲进防空洞。各机关、各单位以及大户人家,有条件的都要挖掘自己使用的防空洞。

红岩村地处当时重庆的郊区,但也经常遭到日机轰炸。八路军办事处就在驻地大梨树附近挖了一个10米长的防空洞,并在洞口搭了席棚,种上藤蔓植物作隐蔽。

由于物资奇缺,条件有限,红岩的防空洞并不十分宽敞。办事处人员自己用还凑合,可附近的一些群众,他们没有条件自己挖防空洞,空袭时也跑进洞里躲避轰炸。这一来,洞里就更拥挤,防空洞顶的泥沙也震动下来。因为没有电灯,洞里漆黑,人群不明方向,在洞口的往里挤,在里面又往外挤。这时,又响起了周恩来宏亮的声音:

“都不要动!安静!”这声音很富感染力,立刻安定人们的情绪。敌机又扔一颗炸弹,防空洞又被震动掉下一些土块,但这会儿人们就都一动也不动了。

敌机飞远后,周恩来走出洞口站着,对大家说:“再耐心等一下!”直到解除警报声响了,他才让大家有秩序地走出洞外,还挨个清点人数,确认没有伤一个人全都安全放下心来。

这一时期,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,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著名时评《用战斗回答敌寇轰炸》,指出:“更积极的更紧张的抗战工作,这是我们对于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的回答。我们要以工作和战斗,来把日寇消灭在它垂死前的疯狂挣扎中!”同时《新华日报》在《以胜利回答敌寇暴行》一文中,向重庆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发出庄严又坚决的誓言:“我们决不会在敌寇残暴的轰炸面前消沉屈服!敌机能够破坏我们的财物,摧毁我们的肉体,消灭城市的繁华,却绝对毁灭不了我们坚强团结抗战的决心。现在,没有任何的外力,能够一丝一毫地动摇我们抗战和胜利的信心。我们决心用最大的力量,来坚持抗战,巩固团结,使民族解放这个全民的伟大事业,真能决定于全民的积极参加。”

此后,周恩来特别注意这个问题。只要他在场,每次躲空袭,都主动招呼群众进入办事处的防空洞,对有些行走不便的群众,还不顾安危,扶助他们进去。每次遇到日机空袭,办事处的同志在躲防空洞途中,往往可以看到周恩来矫健的身影,站在农场的空地上指挥奔跑的人群。饶国模的女儿刘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,就生动地记录了周恩来指挥大家躲防空洞的过程:

一次日机又来空袭,周恩来招呼完大家进洞后,看到办事处的房东、大有农场场主饶国模和女儿还在奔向防空洞的途中。饶国模身胖体重,奔走间已上气不接下气。周恩来赶紧跑过去,搀扶着她,轻言细语地说:“不要紧!慢慢走!不要摔倒了!”饶国模见是周恩来,就着急地说:“周先生,你不要管我。你快到防空洞去!”周恩



点校《山阳志遗》前言

刘怀玉



吴玉搢(1698—1773),字藉五,号山夫,晚号顿研、钝根。天生清癯雅韵,康熙末诸生,补廪生,乾隆十年岁贡生。据吴进《吴氏支谱序》,先世安徽歙县人,明朝嘉靖年间经营盐业来淮,“以金家桥为码头”。《民国歙县志》卷7《人物志·文苑》说他老家是歙县丰南。丰南有一个叫吴孔龙的,字见甫,嘉靖中跟随“从父思云公贾淮阴,所谈盐策,悉中利害”。吴玉搢或即其后裔。吴玉搢的族孙吴进《吴氏支谱序》中说,他家本在“歙县之西溪南,至明嘉靖间,复迁淮安。”吴玉搢在此文末尾加批说,他是“溪南族中人”。西溪南又名丰溪,就是丰南。1988年1月由歙县划入新建的徽州区,今为西溪南镇丰南村。

到了清代,吴家多数已不再经营盐业,而是成为书香人家。康熙三十七年(1698)生于这样一个家族。祖父名会,字东枢,贡生,“绩学植行,里人奉为大师”,死后学者尊为真士先生。父字静公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举人,官安徽广德州学正。当时广德州“州志多讹舛”,吴宁謐“摘数十事,详加考证”。广德“俗奉祀山神,言多荒诞”,乃校删去《山志》中不经之事,“以正其误”。好礼、经、乐府,谙诗诂学。著有《铸错轩稿》、《桐川乐府》。吴玉搢深受其父影响,使他后来成为一位古文字训诂和考据学家。《同治山阳县志·人物》说他:

幼承家学,龆龀好辨识古字,少长究心六书,博通群籍,学有本源。旁及金石彝器,合同异之迹,析流传之变,形声既明,训诂斯

定,因以考证经传,指摘讹谬,勒而为书。若《说文引经者》、《金石存》、《别雅》,皆刊行于世。性乐游览,尝南浮大江,访求奇人逸士,与涉历山谷,采获古迹,证其所学。穷冬匹马走塞上,登居庸关,所至就戍卒野人,叩以山川险塞,时徘徊丛莽落日中,至竟日不食,人多怪之。后游京师,时翁覃溪方纲、朱竹君筠,方以考据金石称专家,闻玉搢至,争出所著以相质。尝主秦尚书蕙田家,蕙田所著《五礼通考》多出玉搢手订。世有奇文残字,博物家所不能辨者,皆踵门求教。晚得凤阳训导,久之告归。”韩梦周《吴山夫先生传》也说,“先生八九岁即喜辨识古字,积数十年久且专,遂成一家学。”

考据学在淮安源远流长,清初的张弨和阎若璩是杰出的代表。特别是阎若璩,是乾嘉学派的先驱,其代表作是《古文尚书疏证》。《清史稿·儒林二》有其传。吴玉搢是其传人,传附《阎若璩传》后:“玉搢,字藉五。官凤阳府训导。著《山阳志遗》、《金石存》、《说文引经考》、《六书述部叙考》,又著《别雅》五卷,辨六书之假借,深为有功,非俗儒剽窃所能彷彿也。”

吴玉搢是著名学者,对淮安地方掌故十分重视,平时注重收集资料,“得一事,谨识之,得一书,谨藏之,将有待也。”等待修志时举以告之。乾隆初年纂修《淮安府志》和《山阳县志》,他理所当然地被聘为编撰人员。但他所提供的许多资料不被重视,未被采用。在府县志修成后,他认为新修的府县志中有一些遗漏和错误,“不独遗,抑有误。误则辨,虽

辨亦误,概以为遗也。不独《旧志》误,或改焉,不误者,翻致误也。”于是撰写了《山阳志遗》。据说吴玉搢撰著本书,也曾得到友人的帮助。《同治重修山阳县志》卷10记载:“杨光曾,字大声,诸生才瑰之裔。博学好古,读书过目成诵,吴玉搢撰《山阳志遗》多与商榷,遣闻轶事,资其搜集。”

《山阳志遗》中所云《旧志》《郡志》,概指乾隆以前的《淮安府志》,包括当时刚编纂印行的《乾隆淮安府志》和《乾隆山阳县志》。书中的内容“止用以补正旧书,非有所接续于其后”。也就是说,只是纠错和补遗,对于乾隆时新编的府县志成书以后的史事,是没有补充和后续的。

吴玉搢说,此书为“私撰”,并非“官书”,所以“不敢表志体”。从全书文字看来,属于地志类笔记体之书。它按内容分为四类:遗迹、遗事、遗献、遗文,即以此分为4卷。《遗迹》载本地诸多古迹之由来及古今之变异;《遗事》记述历史上本地人物或与本地有关人物之事;《遗献》补充、纠正各种文献所载本地有关人物之事;《遗文》补充历代文献不载之本地人的诗文,以及被以往志书所忽略的民间谚语、警句等,对于当地文学,特别是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的研究有参考价值。每条文字不拘长短,视其内容需要而定。长者如“李全乱淮始末”有2600余字,而少者如“韩信剑”仅只20余字。对于前人记述进行纠错与辨证,采用正面叙述,十分平和,并无攻讦之嫌。在补缺方面,有证有据,既不务多,也实事求是,对

于他也不知之事,“仍阙如”,不作强解。这是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。

《山阳志遗》面世以后,一直受到好评。吴进《书山阳志遗·遗文卷后》:“《遗文》一卷,详核可资博洽,其雅趣即作诗话、杂记诸书读,亦发智能无穷矣。”丁晏《柘塘脞录》云:“《山阳志遗》最为赅备;是书‘博采旁搜,析疑辨似,洵足补邑呈纪载之阙。……既足与《邑志》并传不朽,亦使后之留心文献者,广见闻而详考据云。’此书在流传过程中,有别人的一些批语也被传抄,并被刻进书中。除了吴进的两条有署名外,余皆未署名,不知何人所为。”

“龙兴寺火”条后有一段批语,再后为吴进的批语。吴进云:“此批书首者不知谁氏,其人必长于家山夫先生。”可见此书在当时很为人看重,并有同时代人加过批语。

此书以前一直以抄本流传,至民国十一年(1922),淮安志局刊刻《续纂山阳县志》,始用余资为之刊行,列为《楚州丛书》的第一集。书后有周钧的短跋,跋中说,

“虽传钞有集,积久恐散佚无征。”即是说刻印是防止抄本失传,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对的。现在抄本早已湮没,无法找寻,要不是当时予以刻印,即真的有失传的危险。本书使用的底本即是此民国刊本。全文共310条,原无标题,为了检索方便,都拟了标题。在点校过程中,并无别本可作互校。有关人事以及引用文字,尽量用方言、诗文集、笔记和相关的典籍,进行适当的校核,力求完美。但由于学力有限,错误必定难免,请方家指正。

